



战友兄弟，战场身份错换  
烈士战俘，都是为国征战

战争与和平的新叙事 英雄内涵的深度诠释

阅读黄国荣的《碑》，让我想到了如上的标题：英雄要死几次？《碑》所选取的战俘的题材，对于中国当代作家，无疑是具有挑战意味的。它所面对的既有社会生活的容受空间的边界，也有文学自身在处理此类题材上的经验匮乏。于是，作品的主人公邱梦山就必须面对着陈旧而根深蒂固的社会歧见，作家自己则是要在这片荒芜的领地上拓展出一条富有创新性的道路。这种创新既然是时代的，也是文学的。

战争不但有血腥拼杀，也必然会有相当数量的战俘。但是，在强调正义成仁的价值观支配下，战俘是个非常难以处理的题材。我们受到的文学艺术教育，就是宁死不当俘虏，危急关头就与敌人同归于尽。在上世纪50至70年代的文艺作品中，战俘形象是基本阙如的，除非是在被俘后已

## 英雄要死几次？

——黄国荣长篇小说《碑》读后 □张志忠

经叛变，又再度潜伏到革命队伍中来，如《洪湖赤卫队》中的王金彪之流。进入80年代，先是有电影《一个与八个》，后又有《志愿军战俘纪事》，都是聚焦于不同时代的战俘的苍凉命运。21世纪之初，远行美国的哈金，以其《战争废品》，再度揭开了朝鲜战争中的志愿军战俘的累累伤痕，至今尚无缘与大陆读者见面，但是，对作品的争议却也闹哄哄地不亦乐乎（哈金的《南京安魂曲》新近在大陆出版，不知道这是否会为他的作品陆续在国内问世打开闸门）。从基本空缺到争议不断，显示了时代的演进，但是这种演进仍然是沉重得令人窒息，讳莫得不近人情。战俘题材本来是文学的富矿，从肖洛霍夫的《一个人的遭遇》，到获奥斯卡电影奖的《桂河大桥》，其发掘的人性深度和崭露的艺术潜能，都令人拍案叫绝，中国的作家却仍然无法在这一题材上大展身手。是现实使然，还是知难而退？

黄国荣近年来一直是个具有强大活力和可成长性的军中作家。他的作品不曾大红大紫，但是其内在的探索思考却是非常独特而鲜明的，虽然已经过了耳顺之年，仍然在不停地进行挑战，挑战社会见闻和文学成规，更是以今日之我挑战昨日之我，不肯沿着驾轻就熟的写作路径自动延伸，

一定要闹出点新的动静来。其大器晚成，可赞可叹。

英雄的连长邱梦山，在极为艰险的环境中，面对上级的错误命令导致大批战士无谓的牺牲，敢于独抒己见，以临危请命、立功令状的方式，用最小的牺牲夺取了战场的胜局，他的英雄形象由此脱颖而出。但是，他在战场上死过一次之后，阴差阳错地做了俘虏，又被人误认为是与他面貌相似的战士石井生，得以在交换战俘中回到部队。比起当年的志愿军战俘，他已经非常“幸运”，被部队接受，而且还得到了“提拔”，成了军官。但是，陈腐的传统观念仍然在作祟——仅仅是将其归诸传统观念已经远远不够了，传统之所以能够活在人们心中，正是因为它正好迎合了人们的某种阴暗心理：掌握他人的“隐私”把柄，摒弃他人的独立人格，以驰骋自己的“自由”意志，凌驾于他人之上——于是，邱梦山仍然被划入另册，仍然经常要遭受人们的白眼和讥讽。更为重要的是，当年的政治排斥似乎大幅度地减弱了，他的党籍和军人身份得到保留，表明了时代的进步；但是，在那些心术不正而又千方百计钻营的人看来，这是将邱梦山这样的具有威胁性的人物从经济竞争中予以制裁的一张王牌。相反地，站在正面立场上的人们对这一现象仍然无法理直气

壮，无法争得完全平等，更何谈需要充分尊重，需要充分补偿呢？有战争就有战俘，但是，对待战俘的真正理解高度认知，却不知何日到来。像邱梦山，在战场上已经死过一次，走进战俘营，又承受了常人难以承受的痛苦和暴虐，他们已经是双重受到伤害，一旦归来，理应得到加倍的补偿，但是，邱梦山却陷入新的困境。作为儿子，无法与父母相见；作为丈夫和父亲，只能远距离地在绝望中守望；作为一个希望在社会生活中重新崛起、重新证明自己的普通而又不普通的人，他虽然付出了超越常人的努力，却仍然不得不被逼迫辞职，远走他乡。时下有一句流行的话，英雄不问出处。但是，那是在成为英雄而且得到社会的普遍承认之后。谁说邱梦山不是英雄呢？但是，他的命运仍然令人唏嘘。就连他最亲爱的妻子也要经过一段心灵的炼狱，才能真正做好接受他归来的心理准备，才会再度向他发出爱的信息。

邱梦山的意外死亡，缓解了作品所揭示的巨大矛盾，也让善良的读者松了一口气。一个人能够死几次？为什么要让邱梦山这样的英雄再次付出生命，才会真正重返社会，真正被社会所接受？战俘常有，而邱梦山不常有，其他战俘的命运又将如何呢？

《碑》的情节处理似乎受到好莱坞电影《归来的陌生人》的启示，让战后归来的邱梦山以石井生的名字出现，这给作品带来了峰回路转，也给了作家驰骋的想象力。给邱梦山自己的灵魂拷问提供了巨大可能性的空间，同时也给读者留下了体味和遐想的空间，增强了阅读的兴趣。

## 情谊比一切都重要

——王甜长篇小说《同袍》印象 □卢一萍

论出现在她笔下的主要人物王远、肖遥，还是次要人物三班长、队长、光头连连长——哪怕像通讯员何雨林这些次要的人物，她都做到了他们“无论什么时候出现，都会被轻而易举地辨认出来”。

我想，她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她关心的是个人与团体间近乎生物层面的关系，关心的是和平时期部队真生活充斥着的情绪压力，她成功勾勒出现实生活中所能够摧毁或成就他们的力量。她让平凡事物闪耀不凡的光彩。从这些军人的坚持中，可以看出他们的成长以及男子汉的形成。在他们身上，叛逆和理想彼此成长。在描写中国军人的作品中，不乏技巧更高明细致的作品，但没有一本像此书一样正直，并将其发挥得淋漓尽致。该书对军事文学的贡献在于它写活了一群追求光荣、勇气与梦想的新军人群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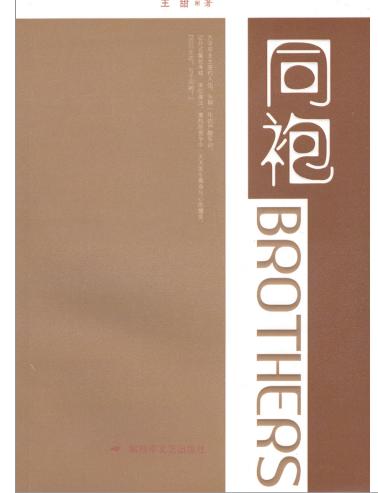
从这部作品的字里行间可以读出王甜是个有中国意识的作家，虽然这种意识还在成长，但尤以为珍贵，因为这是当代作家最为缺乏的东西。这种意识的本质就是让我们看到我们现实生活的真实面目，作家遵从自己的判断，而不使用借来的或时髦或陈旧的标准。王甜在写这本书时，她便化身为一位沟通平凡与崇高生活的信使，她把普通、庸常的生活提升到了传奇、雅致的层面。

军队无疑具有一种钢铁式的硬度。王甜在写作这部作品时，用的是女人的细腻和男人的笔法，所用语汇大胆，情节描述坦率。只要穿过军装的人，都不难感到本书的真实性，她对人物的刻画甚至可与《裸者与死者》媲美，却没有《幼狮》那么露骨地强调主题。从作家对军队生活的精

细描述、有力的对话、故事的张力中，可以看到她对军队生活的熟悉。它倾注了一个作家多年的军旅体验，并作了精准的表达，使整部作品透露出一种内在的锋芒。从这群“真实”的人物身上，我们闻到了部队的新气息，看到了军队在新时期发生质的变化。

这部作品给人留下最深印象的就是故事的流畅性。不少作家对故事持怀疑态度，但我们都明白，讲好故事是小说家最重要的技能。另外，我们对故事的理解应该是美国后现代主义作家多克特罗那样的，他说，“故事就是一种知识体系”，“是人类知识最初储藏室”。他还说，“讲故事，这可能是一种危险的职业”。我想，他之所以这么说，就是因为“每一部小说都是小说家以自己的存在为代价来完成的”，它涉及文学创作的本质。

王甜是一名生活、工作在军队里的作家，对于这部没有战争、没有敌人、没有腥风血雨、没有生离死别的军事题材作品，其本身存在表达的难度，讲述现实军队军人的现实生活，其难度更是倍增。制式的军人生活在和平时期的确差异不大，加之它在意识形态中崇高的象征性，要讲述他们的故事的确需要智慧。这是一种微妙、精确的平衡术。所以，我在翻读第一页的时候，在好奇这个故事怎么讲下去，特别是在共同科目训练结束后，这些大学生因为要到连队实习，先前的对立面——队长也好，三班长也罢——都不存在了，这也预示着预设的矛盾冲突不复存在，一切都需要在新的环境中重新开始。这在小说写作中颇具危险性，王甜却把它讲述得风生水起。她的凌厉之处在于，她知



道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只是一种表象，人类真正的敌人是自己，而自己是难以战胜的。

即使最神圣的经典，比如《佛典》《圣经》，都经历了数千年的口头传播和多种语言文化的文学式表达，如果对照阅读，就会得出一个经验，即使对佛祖和上帝无比虔诚，也不妨碍人们使用叙事策略。王甜讲述这样一个故事无疑也是需要策略的。王甜的聪慧之处在于，她看到了商品社会滋生出来的社会问题，那就是传统观念特别在道德方面的失落。王甜试图拉回这向不知终点景象奔驰而去的道德人心——“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直白的翻译就是，不要说没有衣服穿，你可以穿我的袍子——便成了对我们的警示：情谊比一切都重要，人性的暖意依然存在于我们内心深处。这里的“同袍”正是我们孜孜以求的人间真情，它比战友、兄弟更加深刻、准确，这虽然也是一种战斗友谊、生死之交，但因为它具有人与人之间相互拯救的因素，所以显得更为高贵。

所以说，《同袍》的故事虽然发生在翠鱼梁的装甲团里，但背景却是这个时代。也就是说，它是一部超越了题材本身的小说。

终于有了这样一本书——一本充满青春中国气息的书。《同袍》既是象征，也是隐喻。它正直、蓬勃、躁动，略显忧伤。它是青春的，也是励志的，它是一本关于战友情谊的深刻之作，也是一部成人的童话。它的超凡之处在于它带给你阅读时的赏心悦目。它适合每个有阅读能力的人来读它。它之所以让你不忍释卷，在于文字中蕴涵的气韵，在于故事流动的节奏。作为一个讲故事的高手，王甜会在你开卷之际便牢牢抓住你，让你接受文学和情操的洗礼。

故事的脉络并不复杂，讲述的是28名大学毕业生应征入伍，在装甲团集训队为期一年的严酷军训中所经历的一切。故事大致按他们参加共同科目、带兵实习、军事演习三个阶段演进。这些崇尚自由、个性，追求人生价值的“幼狮”，面对部队高度统一、令行禁止、坚决服从等铁的纪律，时时刻刻处于个人与个人、班与班、男生与女生之间或明或暗的激烈竞争中，每个人每天都在发生着身心的嬗变。故事有军人的情怀、朦胧的情感，有眼泪和欢笑，有黑色幽默式的细节，有对军训生活的介绍，也有对未来的想象。它叙述的语气、事件的内部结构以及语言的使用都处理得恰到好处。作家没有“教导的冲动”，而只是尽可能用真实的生活细节，将地方大学毕业生到合格军官的转变过程娓娓道出，在这个过程中，展现作家对当下军营生活多侧面的审慎思考。

按照传统的说法，真正的军事文学应以战争的矛盾和冲突作为描述的主要内容。因其极为复杂和激烈的冲突，才会有足以让人为之悲喜的文学张力。而《同袍》写的是和平年代一群“准军人”，他们没有可歌可泣的战斗故事，没有英雄式的赎罪情节，怎样表现这些普通人物——按照E.M.福斯特的说法就是“通过单一的思想或品质构建出……形式上最纯粹的人物”——是所有作家都希望解决好的问题。这部作品体现了王甜在这方面的才华，无

### ■想到就说

## 净化屏幕就是净化精神家园

□陈鲁民

影视剧的胡编乱造并非始于今日，我们多少也有些“习以为常”了，但太离奇的情节、太雷人的故事，还是让人无法接受——看了浑身直起鸡皮疙瘩。

关于雍正皇帝，不论正史还是野史，历史留下的记录是，他工于心计，打败了其他弟兄而登位；他搞文字狱，杀了不少知识分子；他勤于政事，自诩“以勤先天下”，一生在大臣的奏折上总共批阅超过千万字。没想到，看了近来密集播出、互打互揭的几部电视剧，这才知道，这老儿原来还是个到处采花留情的“恋爱劳模”，是个怜香惜玉的“情种”。

从去年年底到今年2月，打开电视机，各频道到处都有一个名叫“四爷”的清朝人四处拈花惹草，雍正估计料想不到，300年后，他居然以阅女无数的情圣姿态火爆荧屏，终日忙得不可开交。甲台正和若曦暧昧，乙台又和怜儿缠绵，丙台还苦恋晴川，丁台又娶了甄嬛……网友们感慨：“生活就像四爷，不是你换台就能逃避的。”雍正皇帝变成“恋爱劳模”，堪称时下一些历史剧的编剧、导演，既无冯梦龙妙笔生花的过人

才气，又无曹雪芹苦心孤诣的刻苦精神；既无司马迁写史的一丝不苟，又无鲁迅撰文的深刻尖锐，而只会一味无厘头的搞笑、无原则的媚俗。他们最擅长写的就是宫廷阴谋与争风吃醋，如果有点影子，就会无限放大，添枝加叶，把蛛丝马迹变成通衢大道；如果没有一点根据，那也会无中生有，大胆想象，“合理”设计，“信不信由你，反正我信”。于是，在历史剧里，我们还会很吃惊地看到朱元璋成了缠绵悱恻的“千古情圣”，诗人屈原因暗恋楚王妃而被贬，霸王项羽与吕后暧昧引发楚汉大战，江东美女小乔独闯曹营为曹操煮茶、按摩，老愚公移山的壮举是为了爱情，秦桧杀岳飞是因为岳飞夫人曾被宋高宗赵构临幸等，不仅荒唐低俗、不合情理，也没一点事实依据，甚至连野史都没有记载。这样的作品歪曲历史，亵渎先人，污秽屏幕，误导观众，早就该被扫地出门了。对这种现象，我们应及时

降温、败火、引导、匡正，否则，更离奇、更荒唐、更狗血、更匪夷所思、怪力乱神的东西还会出现。文化是我们的精神家园，决不能任其杂草丛生，净化屏幕就是净化精神家园。

南沙神奇、美丽、迷人的诗意图和边防事

务敏感、沉重、多变的紧张氛围，像冰与火一般相互交融、侵蚀，很不真实又如此真实的相濡以沫。有多美，就有多苦。他们的生存正是一则哲学。守

礁官兵鲜为人知的那些极端艰苦又极端独特的生存状况，深深吸引读者的阅读兴趣。这一切是如此的陌生又妙趣横生，我们不禁怦然心动，过目难忘。鬼台风、太阳雨、大海龟……海盗、蛙人、海空情正常……焦灼的炎热和更为焦灼的寂寞以及它们共同构成的含蓄又热辣的相思惹人心疼。在礁盘上吃一餐饭、洗一个澡、杀一头猪，都不可思议地饶有兴味。在礁盘上，人与月亮、太阳、风雨、海龟仿佛相望相知，似乎回归人类赤裸裸的最初。小岛上的男人们分享食物、分享情书以至分享生命，用几副血肉之躯抗衡无际的海面，肩负庄严的国防，在无数赫然的“巨大”前，在与世隔绝的小生态中，一种几乎难以置信的依恋关系建立起来，如阿铁为了赵海阳的评烈而拒绝领功。人类的情感散发出惊人的力量。超越功利在他们中间变得自然而然。爱和牺牲不再需要冠以某个名义，因为那本身就是生活。

战争描写无疑是整部小说最有看头的部分。它一半天然地得益于礁盘战役的别开生面，另一半当然是作者老到而张弛有度的写作手段刺激得我们惊险忐忑。几次战斗可以单独提出来阅读，不失为一个个构思巧妙、引人入胜的短篇小说。

前方的战场固然揪心，后方礁嫂们的守望更是漫长而琐碎。作者以亲切柔软的目光关注她们，显然这是小说的重头戏。如果说礁盘故事是传奇，礁下礁嫂的生活则散发着浓浓的人间气息。这部分的写作也承载着对花花世界的功能。

作者感情真挚，壮志满怀，激情处常常能透露出不死的少年之志。热爱土地和生活，兴之所致，常常吟诗作赋，洋洋得意。

值得庆幸的是，作者充沛的情感并无自我麻醉之感。军人与他们的爱人，跟普通人一样在受困挣扎，例如陷入官僚体系的无奈、与财富碰面时的相形见绌……作者的浪漫主义不是闭门造车、敝帚自珍，不是昂起头就唱赞歌。文字里处处留下自己的印记，他是通过切肤的体会投入生活，懂得生活之后，做坚定地一跃而超越生活。就像是一个老人，对生活妥协过、抱怨过甚至憎恨过，然而低头看到自己灵魂深处，无论如何都紧紧地被爱国之情牵绊，被唯美的宏愿所牵扯，被崇高的恐怖所震慑。这是作者代入真实留存的心中最爱。他的真诚是真实的，读者能感到。这是难得可贵的，是具有感染人的力量的。作者的浪漫主义诗人气质，保持着让人心碎的脆弱和迷惘，就是年轻人，也在这真诚里理解了他们不可收拾的自我鞭策、自我勘查、自我净化的选择。犹如南沙那些孤独、艰苦却高傲、坚实的高脚屋，被浪涛一次次冲击而屹然不倒。

## 共奏人性与信仰的交响乐

——王筠长篇小说《长津湖》读札 □韩晗

就当下战争题材作品而言，不再仅是对阶级斗争、民族冲突的简单描写，必须要包括对人性的弘扬、信仰的彰显，才能使作家笔下的战争更加有历史感与时代感。因为在和平年代出生并成长的我们这一代人，只能通过这些文学作品才能完成对20世纪那一系列战争的洞察，但这种洞察乃是基于对人性闪光点的捕捉，而不是激起仇恨、崇尚暴力，从这点来说，王筠的长篇小说《长津湖》是一个很好的文本范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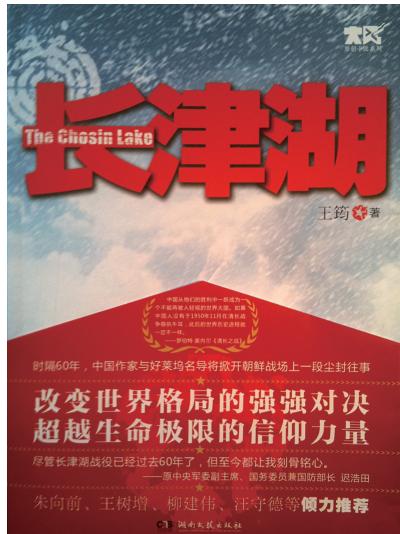
在卫星地图上看长津湖，是朝鲜一块极不规则，处于崇山峻岭之中的庞大水域，此处虽险峻苦寒，风景亦应壮美辽阔，但《长津湖》却以美式大片的笔触反映了作为战场的长津湖之残酷。世界战争史公认，长津湖战役是美国军队在战史上最惨的一次败退，更是抗美援朝战场上最为惨烈的战役之一，但历史告诉我们，越是残酷的战争越能激发人性中最本质的一面，王筠笔下的长津湖战役也不例外。

作为当代文学中一个长盛不衰的战争主题，抗美援朝这一题材在不同的作品中一直发生着时代的嬗变。尽管这些作品都不约而同地告诉我们：这场战争永远是中美双方军力的较量，但《长津湖》所着力笔墨之处，是力图还原并回归人性的历史现场——在极度残酷的恶劣条件下，作为军人的中国志愿军甚至美军士兵是如何克服困难、获得涅槃似的新生。

因此，《长津湖》的核心意义在于，它以文学文本为载体，试图以战争为视角来诠释和平的价值与人性的升华。它坦诚地告诉所有的读者：长津湖战役之于中美两国军来说，都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劫难，气候苦寒、语言不通、思乡之情与物资短缺等致命问题均使中美两国军人同时“遭罪”。没有拘泥于“扬我贬敌”的二元斗争思维的叙述，体现出了作者厚重的人文情怀。无疑，这是当代文学史中关于抗美援朝叙事的最重要超越。

小说以对文化冲突的阐释，叙述了战争让两国军人完成了对彼此“从好奇到了解”的全过程，但这个过程的代价却惨重无比。我们可以看到，吴铁锤的锣在《长津湖》中是一个重要的符号，它曾使美国人闻风丧胆，也曾让志愿军暴露信号。但归根结底而言，这个元素是中国化的，之于美国人来说，神秘的锣声意味着中国军队的迫近，可他们对于这个乐器又是如此地陌生，以至于听到锣声便“就地隐蔽”。同样，刚刚入朝的中国军队对于美国人也基本上一无所知，无论是吴铁锤还是孙友壮，他们面对“美国香油”、睡袋与美式武装时，表现出来的好奇、惊讶，堪称妙笔之行文。但经历了这场战争之后，无论是志愿军还是美军，他们均不再用惊异的眼光来审视“敌人”的一切。我们还必须看到，《长津湖》里对于志愿军战士“来源”的设置，亦反映了作者的良苦用心。可以这样说，这一设置是刻意的，它彻底颠覆了先前类似题材小说里简单的“贫苦大众”格局。《长津湖》里的志愿军战士来自当时中国社会各阶层，其中既有受地主迫害的失地农民，也有国民党部队的投诚士兵，甚至还有投身革命的上海滩知名导演、教会学校里的女学生与英国洋行里的职员。作者之所以如此设置，恐怕很大程度在于表明这支志愿军不再是一支简单的军队，而是代表了当时中国社会各阶层甚至四亿中国人乃至深厚的中国社会和文化了。

《长津湖》里作为符号的一个角色不得不重视，那就是志愿军前卫营教导员欧阳云逸，在这场战役中实际上担任了一个文化冲突调解者的角色。因为他见多识广，操着流利的英语，所以无论是对战俘喊话，还是与俘虏交谈，甚至翻译缴获的情报，他每时每刻都起着“支点”的作用，他的出场甚至还使得美军军官改变了对中国军队的看法。尤其是与战俘麦卡锡的一席对话，堪称小说中最为出彩的一段。在对谈中，麦卡锡认为“当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念受到挑战的时候，我们有责任来维护它”，而欧阳云逸则以“中国的文明博大精深，你理解不了也是



“信仰”是一个与“人性”共生的文学母题，信仰会使得坚持更有意义，这便是志愿军战士们不怕牺牲、屡屡屡战的精神动力，但小说中却没有将这个信仰简单化，这里的信仰不再是先前类似题材小说中的“红旗插遍全世界”这一伟大革命理想，而是中国人普遍的家国情怀，因为是异乡作战，这一情怀自然就变成了对于家乡、祖国的信仰性思念——譬如对于台湾籍志愿军人员、导演出身的凌子林而言，他的信仰只是打完仗“回到上海，再回到台湾”；来自苏北农村的前卫营长吴铁锤的信仰则是“打完了龟儿子陆战1师，就娶媳妇”；而洋行职员出身的欧阳云逸与师医院护士蓝晓萍的信仰则是彼此的爱情约定。在这样的信仰下，他们勇敢地坚持着战争必胜的信念，最终挫败了装备齐全的美军陆战1师，归根结底，这样的信仰依然基于人性的光泽，并由特定的中国文化结构所决定。战争的胜利，很大程度上是信仰所促成，但这个过程与结构又非常复杂。《长津湖》为我们提出了许多之前未曾深入反思过的问题——人性的彰显在战争中究竟能否战胜简单的胜负结果？究竟什么样的信仰才是战争中最核心、最关键的因素？因而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实际上更能反思出人性在战争中所体现出来的价值。毕竟，和平的追求最终将归结于人性的美好，战争的胜负无疑更彰显出信仰的珍贵，但在历史的长河中与人道主义的基石上，胜负已不再是一场战争唯一的评量标准了。

历史地看问题才能对战争有更全面的反思，《长津湖》十余次用了“多年之后”这一“马尔克斯式句式”。小说中幸存者们的表述，使得整个战争的场景更加真实生动，老战士们安详的晚年生活，愈发渗透出信仰的强大、人性的回归与和平的可贵。